成大中文學報　第三十五期
2011 年 12 月　頁 155-182
國立成功大學中文系

想像臺灣的方法：林海音主編《國語日報・周末周刊》時期之民俗書寫及其現象研究（1949-1954）

王鈺婷*

摘　要

本文鎖定林海音主編《國語日報・周末周刊》（1949-1954）時所發表風土民俗書寫，此一時期林海音以英、海音、阿英為筆名，發表描繪臺灣風土民俗的小文，包括歷史、地理、社會、風俗、物產等多重面向，呈現出臺灣的自然景觀、風俗民情與特有產物，但是這些為數眾多的作品，由於缺乏關注，相關研究有待進一步開展。本文嘗試提出與北京童年記事、女性／婚戀主題的林海音既有研究範例之外的新研究取徑——民俗書寫，觀察林海音從哪些角度去呈現臺灣民俗？更重要的是探究這種風土民俗書寫背後的意涵，以突顯出民俗作為一個文化認同的本源：它不僅是族群觀念和文化身分象徵網絡中不可分割的部分，也充斥著強烈的政治含義。本文將通過對於林海音民俗書寫的詮釋，來展現其政治姿態，立場與願望，檢視林海音五〇年代文學的具體貢獻，以表明林海音在政治高壓的曖昧灰色地帶，所開闢出的民俗再現／重構之空間，也使得「臺灣」以更多元地形式顯影。

關鍵詞：林海音、五〇年代、《國語日報・周末周刊》、民俗書寫、文化身分

* 國立清華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Imagining Taiwan: Haiyin Lin's Writings on Taiwan Folk Customs, Traditions and Phenomena Published in the *Mandarin Daily News Weekend Magazine* between 1949 and 1954

Wang Yu-Ting
Assistant Professor, Institute of Taiwan Literature,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literature on folk customs and traditions published in the *Mandarin Daily News*' *Weekend Magazine* during Haiyin Lin's 1949-1954 tenure as editor-in-chief. During this fix-year period, Haiyin Lin wrote prolifically on Taiwan folk customs and traditions under her real name and pseudonymously as I-Ying and Ah Ying. Her essays addressed a diverse array of topics including history, geography, society, local customs and island produce. Subsequent lack of academic attention to this significant early literary effort to introduce and promote Taiwan's scenic beauty, cultural mores and distinctive local products make it well suited to further research. Previous studies have examined Lin's more prominent works, such as *Memories of Peking*, and her perspectives on women's issues and marriage. This paper is the first to examine Haiyin Lin's literary perspective on Taiwan folk customs and traditions, with its inherent meaning used to highlight the role of folk customs and traditions as a source of cultural identity. Folk customs and traditions are not only fundamental to group and cultural identity systems, but also convey strong political overtones. This paper identifies the political attitudes, perspectives and aspirations in Haiyin Lin's writings on Taiwan folk customs and traditions to highlight her practical contributions to the Taiwan literary landscape of the

1950s and demonstrate how she navigated the "gray areas" of contemporary martial controls to open opportunities for cultural rejuvenation / restructuring and for future diversity in Taiwan's growth and development.

Keywords: Haiyin Lin, 1950s, Mandarin Daily News Weekend Magazine, folk literature, cultural identity

想像臺灣的方法：林海音主編《國語日報‧周末周刊》時期之民俗書寫及其現象研究（1949-1954）[1]

王鈺婷

一、前言

呂正惠在〈五〇年代的林海音〉提到林海音在臺灣文壇上特殊的地位，一方面她地位崇高，備受各方禮遇，一方面評論界對於林海音在創作上的成就，至今似乎仍晦暗不明。此外，十分耐人尋味的是，文中提到林海音的貢獻表現在三個方面，恰巧也都是集中在林海音編輯、出版上的傲人成績，一是林海音在主編《聯合報‧副刊》（1953-1963）時期對於本土作家的大力提攜與拔擢；二是林海音創辦《純文學》月刊時，勇於突破當時的政治禁忌，選載中國一九二〇、三〇年代作家的作品；三是七〇年代之後，林海音與臺灣文壇息息相關，所爲人熟知的文壇保姆形象。[2]呂正惠指出由於臺灣評論界對於本土文學之外，一律被劃歸於「反共懷鄉文學」五〇年代文學的漠視，而無法公平評斷林海音五〇年代文學的價值，並舉出林海音最重要的作品都是寫於五〇年代至六〇年代中期，包括《冬青樹》（1955）、《綠藻與

[1] 論文審查期間，承蒙匿名審查委員提出寶貴的審查意見，受益良多，特此致謝。本文爲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報導臺灣與詮釋歷史——以戰後初期林海音之書寫爲考察對象（1948-1959）」（編號NSC-100-2410-H-007-004）之部份研究成果，感謝國科會的經費補助。

[2] 呂正惠：〈五〇年代的林海音〉，收入東海大學中文系編：《戰後初期臺灣文學與思潮論文集》（臺北：文津出版社，2005），頁615-639。關於林海音與臺灣文壇的關係，可參見應鳳凰的論述，應鳳凰：〈閱讀林海音：林先生的編輯、寫作生涯與臺灣文壇〉，《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館刊》11（2003.4），頁89-93。與應鳳凰：〈林海音與六十年代臺灣文壇——從主編的信探勘文學生產與運作〉，收入李瑞騰主編：《霜後的燦爛——林海音及其同輩女作家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南：國立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籌備處，2003），頁337-351。

鹹蛋》（1957）、《曉雲》（1959）、《城南舊事》（1960）、《婚姻的故事》（1963）、《燭芯》（1965）。在此呂正惠認爲林海音應列爲五〇年代臺灣最重要的作家，並且從時代背景出發，以「自由人文主義脈流」作爲切入點，進一步分析林海音的人文精神，呂正惠也特別推崇林海音的散文，認爲：

> 林海音後來的創作重心轉向小說，如果他堅持寫散文，成就也許可以超過五〇年代的女性散文名家，如張秀亞、鍾梅音、徐鍾珮、琦君等人。[3]

呂正惠認爲她除了「家庭散文」與「愛情小說」兩類作品之外，也屢屢以貧苦人家爲題材，在有限的文學空間裡表達其對於人世的關懷，提出林海音不只是關懷窮人或是舊女性，也關懷與尊重每一個具體的生命，呂正惠從此一角度對林海音的作品進行再評價，體現出林海音作爲一個「人文主義者」的特質。

許俊雅的〈論林海音在《文學雜誌》上的創作〉[4]，引發了呂正惠探討林海音五〇年代文學的興趣。許俊雅從林海音與夏濟安兩人在《文學雜誌》的互動談起，探討林海音小說的藝術性及小說風格，她細緻地爬梳林海音在《文學雜誌》上所發表的五篇作品：〈瓊君〉、〈要喝冰水嗎？〉、〈蟹殼黃〉、〈失嬰記〉、〈我們看海去〉，認爲恰好涵蓋林海音寫作的題材，包括童年舊居的北平城南的人事、女性面對婚姻情愛的反應態度、來臺十年間的臺灣生活面貌。許俊雅指出林海音作品中的題材雖有一部分可歸爲懷舊，但是大部分作品仍關注臺灣本地，描寫臺灣經驗，尤其是她將眼光聚焦於對臺灣本省農民的關懷，以及本省和外省人士的接觸與交流，許俊雅經過客觀的研究分析，論證出：

> 她不只寫家庭婚姻生活瑣事，也能抓住時代的脈搏，寫遭逢家國巨變，到臺後喘息未定的大陸人士，作品中充滿難以割捨的戀舊鄉愁之情，也以小視大，展現了濃烈的時代氣息。所寫的本地人事的小說，則運用口語及戲劇張力，呈現卑微渺小的人物在種種困阨環境下的心路歷程。[5]

---

[3] 呂正惠：〈五〇年代的林海音〉，收入東海大學中文系編：《戰後初期臺灣文學與思潮論文集》，頁 620。

[4] 許俊雅：〈論林海音在《文學雜誌》上的創作〉，收入李瑞騰主編：《霜後的燦爛——林海音及其同輩女作家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55-80。

[5] 許俊雅：〈論林海音在《文學雜誌》上的創作〉，收入李瑞騰主編：《霜後的燦爛——林海音及其同輩

許俊雅以林海音作品中所傳達五〇時代氛圍與社會縮影來掌握其筆下的人文風景，並且提示出從林海音作品中的臺灣經驗來窺看林海音五〇年代的書寫特色。

而我們將焦點集中在林海音五〇年代以臺灣爲背景的相關創作，夏祖麗在《從城南走來——林海音傳》中也刻劃出林海音在戰後初期至五〇年代於文壇上相當活躍的身影。夏祖麗提到從 1949 年到 1952 年之間，林海音一共發表近三百篇文章[6]，筆名包括英、音[7]、阿英、阿音、小林、海音等，以小品文和散文爲主，作品散見於《中央日報‧副刊》、《中央日報‧婦女與家庭周刊》以及《新生報‧新生婦女》等文學園地，這些筆觸純樸細膩、態度客觀、敘事明朗的散文，在當時引起不少迴響。夏祖麗也細膩地呈現林海音剛回到臺灣時爲認識自己的家鄉而投注的努力，一爲林海音到省立博物館參閱資料，特地謄寫摘錄下日文版的《民俗臺灣》作爲參考資料，連每期的細目都抄寫下來，寫滿兩本筆記本，也在鴻儒堂高價購買日本作家池田敏雄所撰述的《臺灣家庭生活》[8]；一爲林海音最早參加的文藝團體活動，是由臺灣青年文化協會舉辦的「夏季鄉土史講座」，林海音是唯一的女學員，也從中吸收到許多臺灣史的資訊。[9]

女作家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72。

6 關於此一時期林海音發表作品的數量龐大，是值得採信，但林海音是否發表三百多篇文章，筆者在此先持保留的態度，根據施英美碩士論文附錄中所編纂之林海音文學年表，所整理之戰後初期的文學活動部分有不少篇目經筆者查對爲鍾梅音所發表之散文作品，而《中央日報‧周刊》與《中央日報‧婦女與家庭周刊》林海音署名爲海音，鍾梅音署名爲音，可以此核對施英美所編纂之林海音文學年表進行勘誤，見施英美：《〈聯合報〉副刊時期（1953-1963）的林海音研究》（臺中：靜宜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2003.6），頁 249-366。

7 關於音是否爲林海音筆名頗值得再探究，戰後初期文壇上創作數量相當豐盛的女作家鍾梅音的筆名亦爲音，在《中央日報‧婦女與家庭周刊》的〈本刊作者書簡〉武月卿介紹林海音時提到她與鍾梅音筆名的相似性：「海音爲女士筆名，因其和另一前述之音女士同一音字，曾引起讀者的誤會，爲此音女士及海音女士均先後於三月二日及十一日在大華晚報副爲文說明。」〈本刊作者書簡〉，《中央日報‧婦女與家庭周刊》，1950 年 3 月 12 日。

8 夏祖麗：《從城南走來——林海音傳》（臺北：天下文化，2000），頁 110。

9 夏祖麗提到：「那次有講師十位，大都是臺大教授和文獻會員編纂，他們是楊雲萍、莊琮耀、蔡章麟、盛成、黃得時、廖漢臣、陳紹馨、戴炎輝、衛惠林、方豪等幾位先生。含英覺得，那真是一個開卷有益的夏季，她從中認識了很多臺灣鄉土史方面的東西。講堂上，氣氛是和諧的，沒有鄉土之爭，只有專家學者們的諄諄善誘。學員共有八十人，她是唯一的女性，本省籍的學員占多數，但來自四川、江蘇、福建、安徽、廣西、遼寧的，也有一些。多半是社會青年，公務員、教員、醫師、記者、

在這些介紹臺灣風土的民俗小文中，林海音通常以報導者的眼光敍寫出臺灣獨特的景物、地誌以及風俗歷史，文字淺顯與詞句簡短，淡淡幾筆輕揮，筆觸靈活，充分展現林海音意到筆隨的寫作本領，但是這些爲數眾多的作品，由於缺乏關注，相關研究有待進一步開展。本文將鎖定林海音主編《國語日報・周末周刊》（1949-1954）時所發表風土民俗書寫，觀察林海音從哪些角度去呈現臺灣民俗？更重要的關鍵是探究這種風土民俗書寫背後的涵義？以突顯出民俗作爲一個文化認同的本源：它不僅是族群觀念和文化身分整個象徵網絡中不可分割的部分，也充斥著強烈的政治含義。本文將通過對於林海音民俗書寫的詮釋，來展現其政治姿態，立場與願望，以表明林海音在政治高壓的曖昧灰色地帶，所開闢出的民俗再現／重構之空間，也使得「臺灣」以更多元地形式顯影。

二、思索臺灣・書寫北京的不同路徑——從林海音自我定位與寫作位置談起

林海音自 53 期（1949.12.3）至 301 期（1954.10.24）期間主編《周末》的文藝性周刊。她提到 1949 年進國語日報擔任編輯，《國語日報・周末周刊》前五十期由何子祥所編輯，林海音在編者一百期的回顧中，提到「周末」從開頭就沒有規定固定的內容和形式，提及何子祥在第 1 期時按照「周末」的字面寫了一段有趣的解釋：

> 大概「周末」是在走著「人間味」的路線，所談的都是不出人間瑣事範圍。有人說本報太嚴肅了，「周末」就來調劑這種嚴肅的空氣，但是不離開本報的「教育性的報紙」的信條。[10]

而林海音提及主編《國語日報・周末周刊》時除了保持「周末」「人間味」路線之外，也加入了其他各版所缺乏的翻譯、書評、臺灣風土等資料：

憲兵、警察、商人都有。她很珍惜這次鄉土學習。」夏祖麗：《從城南走來——林海音傳》，頁 110。

[10] 編者（林海音）：〈一百期〉，《國語日報》第 3 版（周末周刊），1950 年 11 月 25 日。

> ……編者接過來以後，心理也有一個計畫，就是除了保持原來的風格以外，還打算加入一些翻譯，書評和臺灣風土等資料，因為這都是本報其他各版所缺少的。[11]

在《國語日報‧周末周刊》中林海音以英、海音、阿英爲筆名，描繪臺灣風土民俗的小文，包括歷史、地理、社會、風俗、物產等多重面向，呈現出臺灣的自然景觀、風俗民情與特有產物。植物如臺灣香花、相思仔、竹、榕樹公；名產如新竹白粉、虱目魚、珊瑚、臺南「度小月」；地方如臺北溫泉漫寫、艋舺、二百年前的北投、鶯歌的故事、阿里山的天天池；民俗如冬生娘仔、燒金、媽祖生、迎媽祖、媽祖和臺灣的神、午時水和扒龍船、過七月、臺灣的灶君、年的準備；俚語如鱸鰻和流氓、學臺灣話的歪路；原住民文化如出草等。

這些描繪臺灣風土民俗的小文，不是純粹的文藝散文，結合生活常識與民俗學的知識，來敘述臺灣的方物與歷史。在與臺灣民俗有關的部分，敘事者隱身爲專業的報導者，每每由挖掘臺灣民俗的由來開始，繼而對種種習俗進行詳細地說明，文字客觀，寫作態度十分認真，譬如在〈關於植物的〉，敘述者首先說明：「一年到頭『拜拜』的臺灣人的供桌上，有幾種東西是不許擺上去。」[12]繼而點名那拔（俗名拔仔）、冬瓜、匏不許上供桌，並且說明背後的文化因素，包括拔仔由於總是連籽一起吃，在人糞裡就可以發芽，爲了這樣不清潔的緣故，是沒有資格上供桌，冬瓜和匏像人的身體，也不能擺上供桌；之後也旁徵博引地陳述移植到普通人家中會帶來不幸的植物：月下美人、榕樹和蓮霧，並解釋「冬荷菜」之臺灣俗名爲「打某菜」之因。[13]〈過七月〉[14]林海音透過引述傳聞的方式說明七月節慶的型態，並補充相關習俗，在〈過七月〉中，林海音首先描述臺灣農曆的七月是一個熱鬧與浪費金錢的月份，並以臺灣俗語：「儉腸勒肚留到七月十五」來加以佐證，細數七月從初一開鬼門就開始熱鬧的景象，林海音也仔細地針對七日這天臺灣人做十六歲的傳統、拜七娘媽的相關習俗做非常細緻地說明，而林海音又提到七日過後各地又舉行

11 編者（林海音）：〈一百期〉，《國語日報》第 3 版（周末周刊），1950 年 11 月 25 日。。
12 英（林海音）：〈關於植物的〉，《國語日報》第 3 版（周末周刊），1950 年 12 月 16 日。
13 英（林海音）：〈關於植物的〉，《國語日報》第 3 版（周末周刊），1950 年 12 月 16 日。
14 英（林海音）：〈過七月〉，《國語日報》第 3 版（周末周刊），1950 年 8 月 26 日。

普渡，包括唱戲、殺豬種種民俗活動，一直到二十九日鬼門關，七月才總算過完，林海音也特別針對宰豬公這種具有祭祀與比賽功能的臺灣民俗慶典多加報導：

> 至於那頭平日養尊處優，吃得比主人還好的豬，這時也得到了報答主人的恩惠的機會，供獻出有限的生命來，給主人換回了無限的光榮。[15]

如果這些民俗小文和林海音以北京童年生活爲主的散文相較，其中呈現的模式頗值得深入探討：前者雖具備林海音節奏輕快、用語靈活的語言特色，但是卻不是全然建立在日常生活的書寫實踐當中，而是以引證資料詳實，並且報導態度客觀著稱。相反地，那些與北京相關的憶舊散文卻往往以林海音自身經歷爲主，有具體的人際互動經驗，以及親切的生活瑣事，不僅描述生動有致，也充滿著林海音對於童年的自傳性地回顧。如《兩地》中的「北平漫筆」，我們讀到的是源於林海音生命基調所譜寫的故鄉之歌，她讓北平城南的風景歷歷再現，也對於北京充滿無限地懷念，從〈秋的氣味〉談到西單牌樓的炒栗子的香和牛羊肉的羶、〈男人的禁地〉回憶做婦女生意的店鋪、〈藍布褂〉談的是純樸北方藍布的特色、〈看華表〉、〈文津街〉中耗費許多筆墨對北京的地景進行白描，林海音對於北京的人情景物如數家珍，如同在〈一張地圖〉中，林海音喜獲友人帶來的一張嶄新的北平全圖，她無限眷慕地說：

> 整個晚上，我們憑著一張地圖都在說北平。客人走後，家人睡了，我又獨自展開了地圖，細細的看著每條街，每條胡同，回憶是無法記出詳細年月的，常常會由一條小胡同，一個不相干的感觸，把思路牽回到自己的童年，想起我的住屋，我的小床，我的玩具和伴侶，……一環跟著一環，故事既無關係，年月也不啣接，思想就是這個奇妙的東西。[16]

這些充滿情感的「城南舊事」，瀰漫著緬懷童年的心情，敷陳往事只能回味的「懷舊情懷」，還原爲一則則在記憶中反覆吟唱的「京華煙雲」，並且在讀者心中烙下異常深刻的印象。

而爲何林海音描繪臺灣風土民俗小文的呈現模式，和其懷念北平的「城南舊事」

---

15 英（林海音）：〈過七月〉，《國語日報》第 3 版（周末周刊），1950 年 8 月 26 日。

16 林海音：〈一張地圖〉，收入氏著：《兩地》（臺北：三民書局，1966），頁 25。

相較，有著如此巨大的差異呢？對五歲時便隨父母定居北京，直到 1948 年才回到故鄉臺灣的林海音而言，臺灣雖是故鄉，實際上不啻爲「新」家園，如同林海音在《綠藻與鹹蛋》的序中吐露出對於第一故鄉的陌生之感，呈現出在臺灣這塊土地上初步摸索的過程：

> 因為自幼在北平長大，雖說回到故鄉，卻要處處從頭認識，又因為換了一種生活環境，在新鮮與好奇的心情下，隨手拈來的寫作題材，不是身邊瑣事的生活趣味，就是第一、二故鄉的風物緬懷。[17]

這也令我們不得不覺察到第一、二故鄉此兩個新舊空間對於林海音的不同意義。當我們將空間座標從林海音以臺灣爲背景的書寫當中凸顯出來，這樣的「懷鄉」書寫卻鮮少具備成長記憶與生活點滴，可以瞥見林海音在思索臺灣空間／北京憶舊有著相異的書寫策略，這其中當然牽涉到林海音自我定位／寫作位置等問題。

林海音書寫臺灣之發聲策略也與身分政治等核心課題交結糾纏，並且和她所處特殊位置有著極爲緊密的關係。具備跨越北京和臺灣多元歷練與複合身分的林海音，在多種意識形態的集匯處，不僅能調和各方勢力的複雜性，亦能充當不同對話折衝之所在，作爲臺灣和大陸之間的中介角色。[18]林海音少爲人關注的一部作品〈霧社英魂祭〉，即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可以用來說明林海音如何以其跨越族群鴻溝的複合身分，來成就「報導臺灣」的發言位置，並維持與鞏固其作爲專業「報導者」的發言人身分。〈霧社英魂祭〉收錄在由張漱菡所主編的戰後第一本女作家小說選集《海燕集》（1953）中，《海燕集》中發表作品者皆爲活躍於一九五〇年代的女作家，包括蘇雪林、謝冰瑩、張雪茵、張秀亞、郭良蕙、艾雯、繁露（王韻梅）、琰如、鍾梅音、潘人木、侯榕生、劉枋、張漱菡、林海音等人，張漱菡在擔任這部選集主編時採取女作家「集體亮相」的策略，於每篇作品前附上女作家的肖像，並以圖文並茂的方式加入編者的介紹，將亮麗的女作家肖像照與短小俏皮的文字作有機地結合，形塑出美麗的現代女作家形象，張漱菡爲林海音所寫的介紹詞，也凸顯

---

17 林海音：〈好的開始〉，收入氏著：《綠藻與鹹蛋》（臺北：遊目族文化出版，2000）。

18 此一觀點闡示於筆者拙文，〈報導者的「中介」位置——談五〇年代林海音書寫臺灣之發言策略〉，《臺灣文學學報》17（2010.12），頁 133-158。

出林海音跨越族群鴻溝之複合身分：

> 純粹北方小姐型的本省籍作家林海音，爽直而詼諧，作品極富人情味，深刻動人，備受讀者擁護，她為本省爭取了光榮。[19]

張漱菡也勾勒出林海音融合不同族群的文化位置：「純粹北方小姐型」和「本省籍作家」，林海音多重身分也成爲彰顯她身分屬性的指標。在《海燕集》這一群外省女作家群像中，林海音的確是極爲特殊的存在。《海燕集》中多數外省女作家皆發表「革命加愛情」的小說，將談情說愛的通俗劇架設在反共抗日的大時代場景之中，除了回應五〇年代的主導文化之外，也藉由浪漫化的情調增加小說的可讀性，並吸引消費市場的讀者目光，而值得注意的是林海音在《海燕集》中發表的是凸顯其「臺灣報導者」身分的〈霧社英魂祭〉，小說副標爲「一個不甘壓迫的民族的血淚故事」，〈霧社英魂祭〉內容涉及一九三〇年代臺灣史上最受矚目的原住民族反抗事件——霧社事件，林海音以類似報導文學的寫法，帶有非虛構性文學的寫作方式，延續新聞報導／史傳文學的基礎，文本中從霧社事件近因，來深入霧社事件爆發的導火線，著重於泰耶魯族人不屈的抗爭精神，在此將不延伸探究〈霧社英魂祭〉在《海燕集》所呈現的意圖，僅關注於林海音在此所呈現出臺灣「報導者」的姿態。

林海音選擇以「報導者」這樣的書寫姿態來記錄臺灣，主要也來自於林海音具有中國經驗／臺籍身分，由此一雙重身分所形塑出的特殊發言位置。相較於林海音在〈「半山」還鄉記〉[20]和〈光復之後〉[21]描述「半山」重返故鄉臺灣時所經驗到複雜的認同困境，飽含流離後回歸的創傷，也呈現出「半山」之於臺灣人認同主體「既內而外」的內在矛盾，與身處於大陸和臺灣文化夾縫處的苦澀印記，充分說明了半山還鄉之掙扎／不容於報導者位置的游移不定。然而，林海音回到臺灣後大規模地書寫臺灣的風土民情與地理景觀，在介入報導者的位置時不自覺地挪用到較爲優勢的「半山」位置（此指其複合身分所具有的優勢性），以自外於本地角度來再現臺灣風土民俗，與在家鄉內外流離失所的真正「半山」比較，林海音無疑擁有更優勢

---

19 林海音：〈霧社英魂祭〉，收入張漱菡編：《海燕集》（新竹：海洋出版社，1953），頁 150。

20 海音（林海音）：〈半山還鄉記〉，《中央日報》第 5 版（中央副刊），1949 年 4 月 17 日。

21 海音（林海音）：〈光復之後〉，《中央日報》第 8 版（中央副刊），1950 年 10 月 25 日。

的選擇權，使其「中介」的發言位置在面對不同文本現象時有其辯證性挪移，也歷經一個較複雜的「協商妥協」（negotiation）。在文化界觸角廣泛的林海音，由於語言的優勢進軍文壇並成為報社主編，集作家、編輯等頭銜於一身，其「亦中亦臺」的複合身分代表了一種很獨特的身分位置：這位置是「來回跨界」的、複雜的以及雙向的。以下將探究林海音筆下與風土民俗有關文本之背後的含意，特別是林海音作為臺灣與中國之間中介的角色，也影響了其對臺灣風土民俗書寫的想像與建構。

三、建構臺灣想像的主要途徑之一——中原論述對於臺灣文化的詮釋

林海音回憶為了填滿《國語日報‧周末周刊》的空白欄位，在此一時期寫了許多與臺灣風土有關的小文：

> 那時的國語日報沒有今天這麼神氣，每個星期為了填滿這個沒有稿費的週刊，自己總要寫些文章。我便在那個時期寫了許多臺灣的風土人情的小文，都是聽到的，看到的，隨手記了下來。材料很多，寫作慾也很強，剪報留到今天，紙都發黃變脆了。[22]

這類的隨筆文筆平易近人，內容多樣而龐雜，雖然林海音看似把隨意選取的材料拼湊在一起，將「耳聞眼見」與臺灣風土民俗有關的材料組串成文；但林海音往往在文本中穿插大量歷史資料、傳說等，甚至直接引用一段史書文獻，寫作態度認真，資料豐富，這些史料的運用值得我們進一步推敲的地方是，它巧妙地開啓了林海音對臺灣地方想像。若以文本為例，做更進一步的觀察，可以瞥見這些小文雖以臺灣為背景，也描述斯土斯民的生活現象，但林海音並非單純地從臺灣本地來切入視角，反而是以中國文化為參照系譜來啓動對臺灣的觀看，某種程度上來說，中原論述對於臺灣文化的閱讀也成為林海音建構臺灣想像的主要途徑之一，這也是林海音一九

[22] 林海音：〈「兩地」的自序〉，收入氏著：《兩地》，頁 1。

五〇年代書寫臺灣相關文本中一個甚為重要，卻從未被論者提及的一個關鍵點。

我們可以在林海音筆下看到她參照明清中國方志或是文人筆記，如 17 世紀郁永河的《稗海紀遊》，或是 18 世紀黃淑璥的《臺海使槎錄》中對於臺灣風俗的紀錄與描述，嘗試從中國歷史及文化的傳統中來表述臺灣「民俗」的特殊性。如〈艋舺〉一文，林海音重新詮釋萬華地名的定義，她提到艋舺是萬華的舊名，為日本大正 11 年（1922 年）改定，並以臺灣的俗語：「一府二鹿三艋舺」，來表明艋舺昔日的光彩，指出艋舺不僅是本省人聚居的地方，代表著臺灣固有的風俗，也保留真正的臺灣風味。林海音試圖從住民與地理景觀的關係性來解釋地名，強調艋舺是面臨淡水河的北部碼頭，在漢人沒有到達前，是原住民的居住地，「艋舺」也取自於高山族在淡水河所划的獨木舟之名：

> 艋舺原是高山族語的譯音，所以最初也有諧音做「莽葛」或「蟒甲」等名的。這在前人的文獻裡都可以看到，像清朝郁永河的「稗海紀遊」，有一天的日記裡就說他曾坐一種用獨木鏤成的蓄舟，可以容兩個人，對面坐各划一槳渡河，名子叫「莽葛」。又黃叔璥的「臺海使槎錄」裡也說他過淡水港時坐的是「蟒甲」，都是指的後來的艋舺，現在的萬華。[23]

林海音引述《稗海紀遊》與《臺海使槎錄》中對於「莽葛」或「蟒甲」的描述，很認真嚴謹地考掘「艋舺」這個地名，讓讀者藉由她細心推砌的資料，來接近「更真實」的歷史詮釋。譬如林海音對於北投風土民情的描述，也透過《稗海紀遊》來還「原」溯「本」，由康熙年間郁永河所提供的歷史圖像開始挖掘，企圖尋找北投二百年前的土地面貌、生活樣貌、傳統習俗等。這些史料的運用，過往是作為「真實」或「客觀」知識的假設，然而從今日學術研究的觀點看來，自然是問題重重。在「新歷史主義」的風潮影響之下，歷史不再被視為史料與文獻的客觀再現，而是不斷修正、詮釋與建構的產物，如 Hayden White 認為歷史書寫不能不考慮人為建構的層面，其中也包括書寫者「如何」和「為何」敘寫歷史，這也涉及歷史書寫中種種的權力關係，諸如書寫者的書寫動機、詮釋觀點、意識形態等，都會影響到歷史書寫的面

[23] 英（林海音）：〈艋舺〉，《國語日報》第 3 版（周末周刊），1950 年 12 月 23 日。

貌。[24]

如果以《稗海紀遊》爲例，這部與《臺海使槎錄》相提並論，被葉石濤譽爲「臺灣風土人物景觀的雙璧」[25]的佳作，雖然這部書過往被視爲研究臺灣早期文化史資料而備受學界重視，但是如果我們更進一步追問《稗海紀遊》是否可視爲清朝臺灣社會的客觀再現？或者是郁永河的歷史書寫是否真實無誤？這過去一度被視爲理所當然的答案，如今已成疑問。《稗海紀遊》的歷史書寫無非是一次再詮釋的過程，宋澤萊也認爲《稗海紀遊》和中古歐洲的傳奇故事相似，必須用傳奇文學的觀點來閱讀其中神奇鬼怪的情節，並且從 Robert L. Scot 所提到的修辭爲一種了解事物的方法，來分析《稗海紀遊》裡的修辭法，如何進一步「發明臺灣」，宋澤萊分析：

> 《稗海紀遊》這本書其實是郁永河用種種的修辭法，可能包括運用了「摹寫法」「比喻法」「排比法」「誇飾法」這些文法修辭，以及運用傳奇模式、形式論證、保守主義意識形態……而產生的，是他用了這些修辭技術來構成這本書，而這本書就是郁永河對臺灣的所有認識。[26]

在此宋澤萊企圖藉由修辭法的方法學，將郁永河的意識形態定位在大清帝國統治者的意識形態，郁永河的「中原主義」因而被挖掘出來。然而，相較於宋澤萊將郁永河劃歸爲具有統治階級的優越意識形態，何素花卻將我們的注意力引到郁永河更細緻的身分位置，並且呈現出當時大陸來臺人士所具有的複雜光譜。何素花認爲郁永河並非在臺擔任純官員身分之大陸人士，使得他比起一般大陸在臺的官吏多一份文人關懷的立場，能從人類學的角度來探索平埔族的歷史圖像；但是來自福建內地半官方的幕客身分，對於郁永河亦有一定程度的影響，也使得他免不了受到統治階層的思考侷限，有時亦抱持著上國的心態來看待荒蠻化外的臺灣社會，並且以上國衣冠之傲來採風寫實，沒有深入去理解臺灣。[27]

---

24 Hayden White, *Metahistory: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3).

25 葉石濤：《臺灣文學史綱》（高雄：文學界雜誌社，1987），頁 4。

26 宋澤萊：〈評郁永河的《稗海紀遊》——並論臺灣文學史上的傳奇時代〉，《臺灣學研究通訊》創刊號（2006.10），頁 112。

27 何素花：〈清初大陸文人在臺灣之社會觀察——以郁永河的《稗海紀遊》爲例〉，《臺灣文獻》53：1

在此將問題導回林海音奠基於《稗海紀遊》的歷史書寫而得到的臺灣圖像，又是呈現出什麼樣的構圖？〈兩百年前的北投〉也透露出作家的想像和所謂歷史真相之間的張力，她筆下的文本，也不知不覺多有指向「臺灣」在清朝歷史文本敘述裡的「蠻荒瘴癘」，呈現出臺灣惡劣的異地風情：

> 「稗海紀遊」是清康熙三十六年，郁永河從福建渡海來臺，當年四月由臺南到北投採硫礦時所記的日記。從臺南到北投，現在坐火車不過九小時，可是在二百年前，郁永河卻嘗盡了千辛萬苦。那時的北投也不像今天這樣的花街柳巷，使人留戀。而是人們一提起就「欷歔悲嘆，如使絕域」的地方。[28]

林海音引證《稗海紀遊》以彰顯出北投土地的嬗變，一方面運用英勇主人公／蠻荒異地二元對立的策略，來建構起郁永河冒險犯難、百折不撓的形象，並增添郁永河身上傳奇性的色彩；一方面林海音也透過郁永河筆下北投開墾的地誌書寫爲例，企圖尋找北投真正、確實的「本源」，她推崇郁永河爲開墾北投的開山祖師，某種程度上有爲北投「追本溯源」、認祖歸宗之意：

> 這樣看來，郁永河可以說是北投的開山老祖。今天到北投「遊焉、息焉」的人，看到眼前的繁榮太平景象，想著當年郁氏的出生入死，披荊斬棘的情形，不會相信這就是二百年來同一的一塊地方。而北投的侍應生們如果「拜拜」的話，也應當不忘給郁氏燒一股香才對。[29]

然而，在此想要特別提到史料的運用也影響林海音筆下風土民俗現象的呈現模式，其中最重要的關鍵在於林海音如何複製郁永河等人的視線來「發現」臺灣，並且與大陸旅臺文人及其中原之眼產生互爲建構的關係。

所以，如果我們從這樣的脈絡來閱讀林海音筆下與臺灣風土民俗有關的書寫，很明顯地可以看到林海音在多篇文章中對於臺灣民俗的關注，是與中國文化聯繫在一起，呈現出臺灣／中國文化不絕如縷的關係，並且將臺灣民俗／中國文化做縱的連結。譬如，〈冬生娘仔〉一篇，林海音記述臺灣女孩子到了十幾歲喜歡做「冬生

（2002.3），頁 167-199。

[28] 英（林海音）:〈二百年前的北投〉,《國語日報》第 3 版（周末周刊），1951 年 2 月 17 日。

[29] 英（林海音）:〈二百年前的北投〉,《國語日報》第 3 版（周末周刊），1951 年 2 月 17 日。。

娘仔」此一習俗，指出「冬生娘仔」在福建民間也頗爲流行，並引述福建所流行的民間傳說，將在天上犯罪而被玉皇大帝懲罰落到塵世的美麗花神「冬生娘仔」之不幸遭遇表露無遺；呈現出擅長綉花的「冬生娘仔」，卻在千載難逢的楊梅開花之夜不幸失足而死，而令無數女孩們憐惜，並在「冬生娘仔」的祭日特爲祭祀。林海音在此略爲比較閩南風俗的不同，以闡明「冬生娘仔」民俗典故的意義，並勾勒出「冬生娘仔」民俗傳說的由來，也從「閩南風俗」的文化脈絡比較不同區域「冬生娘仔」祭日的差異，最後闡述祭歌中所呈現此一民俗的文化意義爲「無非是培養女孩子們使成賢妻良母，教她們對於家事更感興趣」[30]，林海音將「冬生娘仔」放在「閩南風俗」這一個較大的架構中來討論，也提示我們臺灣民俗和中國文化有密不可分的關係。此外，例如林海音談到農曆三月二十三日的「媽祖生」時，她引用一千多年前中國宋朝與媽祖有關的種種傳說，某種程度上也「溯源」中國文化，以其爲臺灣文化傳統的源頭，包括宋太祖建隆年間喜愛誦經禮佛、深具慧根的林默娘成爲通賢靈女，道成升天的過程，以及自宋元清以來歷朝都曾因媽祖顯聖靈驗而加以褒封加封的神蹟，表明以上皆爲「正傳」，也強調媽祖爲航海守護神，勾勒出臺灣文化當中的媽祖信仰與特殊移民性格之間密切的關係，並以「臺灣移民從風浪多險的臺灣海峽渡過來，在科學不發達的時代，怎不能不把生命寄託在神明的保佑上呢？」[31]作結。

四、文化認同網絡的重要途徑：「被發明」的民俗書寫

張隆志在〈從「舊慣」到「民俗」：日本近代知識生產與殖民地臺灣的文化政治〉中所展現的論述取向，可以提供我們一種觀看林海音風土民俗書寫的取徑。張隆志先勾勒東亞地區民俗學傳統的形成，與十九世紀後期以來帝國主義及民族主義

[30] 英（林海音）：〈冬生娘仔〉（下），《國語日報》第3版（周末周刊），1951年1月6日。
[31] 英（林海音）：〈媽祖生〉，《國語日報》第3版（周末周刊），1950年5月6日。。

的歷史有密切關聯，再透過舊慣與民俗兩種殖民知識類型和文化政治脈絡的比較，說明文化如何成爲展現日臺殖民知識和權力關係的重要場域，並且反映近代臺灣的殖民地學術脈絡與文化知識的過程，張隆志便以「被發明的傳統」來指稱民俗學在近代民族國家建構過程中所具有的政治取向：

> 民俗研究（folklore studies）作為歐洲近代學術的一環，有其特殊的歷史與文化脈絡。民俗調查與研究，一方面成為文化帝國主義與殖民統治的知識活動，一方面也成為民族國家建構文化認同的重要途徑。民俗研究除了批判西方啟蒙現代性和現代化論的特徵外，民俗學本身亦成近代化與民族國家建構過程中「被發明的傳統」（invented tradition）。[32]

我們必須把此一論點放在英國左派史家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的論述模式下，才能了解張隆志所提出的議題與當今文化批評取向的關係。霍布斯邦認爲所謂古老淵源的傳統往往是晚近才發明出來的，「被發明的傳統」（invented tradition）是一系列的實踐，具有儀式性或象徵性本質，透過節慶、集會等公共儀式的發明、偉人銅像或紀念碑的大量生產，或是透過典律的傳承教育，不斷地重複，試圖灌輸大眾特定的價值觀與行爲規範。[33]霍布斯邦解釋傳統何以被發現或是重構，或是本來默默無聞的傳統何以能重見天日呢？他認爲傳統和過去並不具有絕對的關係，而是仰賴創造而再生，其中有一個重要的關鍵在於「人工的接合」：

> 傳統的「創發」其特殊性就在於：這樣的傳統與過往歷史的關聯性是「人工」接合的。簡言之，被創造的傳統是對新時局的反應，卻以與舊情境相關的形式出現，或者以類似義務性質、不斷重複的方式建立自己的過去；一邊是現代世界的經常性變動與創新，另一邊是在社會生活中儘可能維持現狀的企圖……[34]

所以，傳統的被發現不啻爲一個建立傳統的過程，在此一過程中，自有某些傳統被

---

32 張隆志：〈從「舊慣」到「民俗」：日本近代知識生產與殖民地臺灣的文化政治〉，《臺灣文學研究集刊》2（2006.11），頁 34。

33 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等著，陳思仁等譯：《被發明的傳統》（臺北：貓頭鷹出版，2002），頁 11-26。

34 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等著，陳思仁等譯：《被發明的傳統》，頁 12。

認定爲有價值的，因此成爲主流論述的中心，傳統也因而獲得保護而免於流失的命運，傳統之創造也必須透過一套象徵符碼或是儀式，以不斷重複的形式來灌輸大眾。能夠在文化領域中崛起的傳統，是發明的，亦是操作的，與論述的。

雖然，林海音不斷地以文字記載臺灣的民俗風情，但是不論林海音透過各類傳說來再現臺灣民俗，或是參照明清中國方志或是文人筆記來追尋與考據臺灣地名的源流，也企圖透過刻意篩選的傳統文化，來進行對於過往傳統文化之「人工的接合」。如果我們試圖回應霍布斯邦提出傳統之發現，端賴賦予其意義的社會與歷史環境的重要議題，林海音書寫中也被寓寄了現實的目的：強調臺灣和中國所共有的傳統文化，以及臺灣受到中國文化承傳的影響，也回應民俗此一課題在民族文化的建構中扮演著特別的角色。民俗不僅成爲民族國家再造歷史記憶與文化認同等的關鍵內涵，也建立起民族論述的權威性，並且與文化身分（cultural identity）的建構有著非常密切的關係。

在此我們必須回到張隆志對於戰後民俗研究的精要分析，他特別延伸說明臺灣民俗研究從戰前至戰後特殊的發展軌跡。張隆志認爲相較於中日韓等東亞地區民俗學的連續發展，戰後臺灣的民俗研究則由於殖民學術情境與去殖民過程的雙重因素，臺灣地方宗教、民間文學、以及民俗曲藝等課題的討論，長期以來仍附屬於中國俗文學、中國地方史及漢人社會研究等不同學科領域，直至一九八〇年代臺灣本土研究風潮興起，如劉還月、林美容等專家學者的投入，才出現追求具臺灣主體性的本土民俗學典範與論述。[35]從這個角度看，我們便可以推測由於戰後學術傳統斷裂與交叉移植的現象，以及臺灣民俗研究受到學科領域制約等要素，使得與臺灣有關的風土民俗論述，一直受到相當冷漠的對待，也必須依附在中國文化的框架中才

[35] 張隆志：〈從「舊慣」到「民俗」：日本近代知識生產與殖民地臺灣的文化政治〉，《臺灣文學研究集刊》2（2006.11），頁 33-58。感謝審查委員的寶貴意見，提示筆者從許常惠與史惟亮在 1967 年展開第一次民歌採集運動的研究方向，此一民歌採集運動對臺灣民歌運動史和臺灣文藝發展史有深遠的影響，也影響七〇年代中期源自於民間草根之民歌運動與雲門舞集之文化重建。民歌運動的過程，請參見許常惠：〈民族音樂的整理與發展〉，《雄獅美術》86（1978.4），頁 104-109。民歌運動對於臺灣民族音樂發展的意義，請參見劉智濬：〈從啓蒙觀點看六〇年代民歌採集運動〉，《中臺學報》14（2003.5），頁 279-295，及廖珮如：〈「民歌採集」運動的再研究〉，《臺灣音樂研究》1（2005.10），頁 47-98。

有討論的空間。林海音的臺灣風土民俗書寫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主流意識形態的影響。林海音在 1966 年出版的《兩地》其表述方式與編排也透露出這樣耐人尋味的訊息：《兩地》書的標題「兩地」是指臺灣與北平。臺灣是林海音的故鄉，而北平是其成長的地方，不過如果仔細推敲林海音在自序中，可以發現《兩地》並非僅僅是懷鄉之作，而是流露出濃厚的中原情結，並且有意建構起臺灣／祖國的緊密聯繫：

> 當年我在北平的時候，常常幻想自小遠離的臺灣是什麼樣子，回到臺灣一十八載，卻又時時懷念北平的一切，不知現在變了多少？總希望有一天大陸光復，噴射機把兩個地方連接起來，像臺北到臺中那樣，朝發而午至，可以常來常往，那時就不會有心懸兩地的苦惱了。人生應當如此，我相信早晚會做到的。[36]

五、國府文藝政策主導下曖昧的灰色地帶——從邊緣出發的臺灣民俗發言位置

然而，如果回到一九五〇年代的文學場域，我們當然要思考在當時臺灣的歷史社會環境中，臺灣風土民俗究竟占取什麼樣的位置？有什麼樣的發言空間？這會帶領我們更趨近於此一歷史時期的林海音爲何以中原論述爲參照系譜去呈現臺灣民俗。這必須從臺灣民俗書寫在一九五〇年代文化場域扮演的角色，以及民俗書寫作爲一九五〇年代文化場域所發揮的政治和社會效應談起。在戰後官方文藝政策中，臺灣符號是一個禁忌，也長期受到壓抑，能夠突破壓抑狀態只有將臺灣文化放在「文化中國」的框架中來進行討論。換言之，臺灣民俗書寫在官方文藝政策中得以呈現之契機在於：書寫臺灣的民俗經驗，必須符合國家宣傳文學對意識型態的純正要求，實踐反共文藝政策中的愛國論述，縫合入「中國性」之確認，呼應中國民族主義的論述。

所以，首先必須明辨的是處於一九五〇年代特殊的歷史脈絡的風俗書寫，不僅

[36] 林海音：《兩地》，頁 1-2。

須提供當時大中國政治意識型態所需要的文化象徵，也必得支援中華民族主義的發展。如果，我們更進一步來談，林海音擔任《國語日報‧周末周刊》的主編，以及《國語日報》此一文學媒介的定位與特質，更可藉此釐清林海音臺灣民俗書寫必須以何種形式來與中國文化進行協商。《國語日報》在戰後官方推行的國語運動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和官方所認可的國家語言政策之間，形成某種共構的關係，它是輔導學習國語的刊物，也提供眾多讀者學習「正確中文」的基礎範本。譬如在〈本報的讀者對象和「趣味」〉針對讀者提問國語日報各版的文字深淺不同，究竟是以何種程度的人爲讀者對象？編者回覆：

> 本報是一個輔導學習國語的刊物。現在在臺灣學習國語的人有種種不相同的程度和需要。……據調查本報的讀者大中小學的程度都有，所以不能不作多方面的適應。[37]

也針對讀者認爲報紙內容太平淡，缺乏驚奇發辣，動人心魄的新聞和文藝，要求貴報多刊登趣味新聞，或是偵探小說、神怪劍俠的故事、情致纏綿的愛情長篇，而編者回覆認爲趣味是多方面的，不正當、低級的趣味不必提倡，也反對迷信、色情、時代落伍的材料，並以食品作爲比喻，認爲願意供給讀者大米麵粉白菜豆腐，不願意供給濃烈的酒、芬芳的煙，並且重申：

> 本報是一個教育性的刊物，所收材料必須顧到教育意義和價值。[38]

《國語日報》作爲國民政府遷臺以來以國語爲本位的輔導刊物，其中的政治意義頗值得再三推敲。林海音能夠主掌報刊的編輯，也來自於其接受過中國文化教養所具有的語言資本，並藉由文藝修辭及其涵養，獲取文化和象徵資本，躍居爲大報社的主編。

我們回到林海音選擇描繪臺灣風土民俗此一課題上，當然符合強調臺灣文化是中國文化的支脈這樣的主流論述，也符合官方論述的期待。但是，有大陸經驗的林海音爲何不直接撰寫國族鄉愁和中原情結，以符合反共文藝大行其道的一九五〇年

[37] 編者：〈本報的讀者對象和「趣味」〉，《國語日報》，1949 年 10 月 30 日。
[38] 編者：〈本報的讀者對象和「趣味」〉，《國語日報》，1949 年 10 月 30 日。

代，反而選擇鋪述臺灣經驗的民俗書寫，以這樣頗為迂迴的路徑，來進入與中華民國史觀鏈連的臺灣風俗圖像中呢？林海音依附國民政府樹立語言系統的權威刊物來書寫臺灣民俗，企圖奪得一個「臺灣」的發言位置，也無非展現出從邊緣出發的臺灣書寫發聲策略所具有的可能形式。林海音所創造出來的是國府強勢文藝政策主導下曖昧的灰色地帶，正是這樣一種可能，她才得以為自己標劃出一個書寫臺灣的空間，如果將林海音臺灣民俗書寫只簡單地解讀為「替臺灣文化代言」，恐怕會誤解本論述由林海音多元文化身分所開展的複雜閾境。事實上，林海音在五〇年代發表過大量介紹臺灣鄉土風物的散文，雖然一方面強調臺灣文化／中國文化傳統的互動，一方面卻也在這樣的文化脈絡中探討立基於臺灣歷史經驗的風土民俗，來呈現臺灣的風俗民情，刻畫在地庶民方言與民俗文化，反映出臺灣社會獨特的人文特色，如〈臺灣的香花〉一文中以：

> 有人說臺灣是個「花不香，鳥不語」的地方，後者我也頗具同感；說「花不香」，我卻難同意。臺灣的香花我可以舉出許多種，而且都是常見的。[39]

並舉玉蘭、夜百合、含笑、茉莉花、素馨等臺灣香花為例加以說明。又如〈午時水和扒龍船〉中，林海音雖然提到端午節不是臺灣人獨享的佳節，任何中國人對它不陌生，但也特別報導臺灣除了包粽子以外，和內地不同的風俗，引用臺灣俗諺：「插榕較勇龍，插艾較強健」，描繪出臺灣人家家戶戶在門口掛上菖蒲和榕樹枝，並用菖蒲煮湯來洗澡，也以「食菜豆食較老老老，食茄較雀躍」和「食桃肥，食李美」等俗語來提示出臺灣人於端午節要吃的幾樣食物，包括：菜豆、茄子、桃與李等，並且提到端午節這天中午，大人小孩提著罈子到井邊汲水收藏起來，稱為「午時水」，據說午時水是永不變質，可以當做解熱的內服藥，也可當做外科的洗藥，並以「午時水，飲著肥且美」的方言來折射出「午時水」的妙用。[40]

林海音所撰述的民俗小文除了使林海音重新確認鄉土之存在，深入淺出地剖析臺灣民俗，也頗能與想像中的外省讀者進行互動，巧妙地開啓異文化觀看交融與互

39 英（林海音）：〈臺灣的香花〉，《國語日報》第 3 版（周末周刊），1950 年 12 月 2 日。

40 英（林海音）：〈午時水與扒龍船——臺灣端午節〉，《國語日報》第 3 版（周末周刊），1950 年 6 月 17 日。

動對話的契機。夏祖麗在《從城南走來——林海音傳》中特別指出臺灣鄉土風物爲主題的散文：

> 絕大部分是介紹臺灣的鄉土風物，像〈愛玉冰〉、〈臺灣的香花〉、〈臺北溫泉漫寫〉、〈鱸鰻和流氓〉……。這一篇篇短短的民俗小文寫來親切有趣，當時一些從大陸來臺的外省讀者特別有興趣看。[41]

夏祖麗的說明，饒富趣味之處，在於指出這些介紹臺灣鄉土風物的民俗小文，吸引當時移居來臺外省讀者的目光，外省讀者也構成了民俗小文的主要讀者群。〈燒金〉一文，留下林海音與對臺灣風土好奇的外省讀者進行互動線索。林海音敘述一位外省人要燒些紙錢以祭母，卻因語言不通，那天也正好是臺灣人祭土地爺的日子，店員就交給他一疊「福金」的紙，他回到家裡恭恭敬敬的燒了，到後來才知道他母親不會得到這筆錢，因爲「福金」是專燒給土地爺的，林海音繼而說明銀錢才是爲祖宗、鬼及喪事所用：

> 臺灣人的祭祀裏，無論祀天、祀神、祀鬼、祀祖宗，一定要燒紙，就是平常到寺廟裡小拜也要「燒金」。臺灣的錫箔雖然簡單，祇在粗糙的小方塊竹紙上附著一張金色或銀色的箔。但是種類和分別卻很多。大體說來，金紙是為神的，銀紙才是為祖宗、鬼及喪事所用。金紙又分許多種，哪種神用哪種錢都有一定，不像咱們人間，富貴貧賤都用新臺幣。[42]

林海音能夠與想像中的外省讀者交流，圍繞在林海音所擁有臺灣旅居大陸人士所俗稱的半山身分，在土生土長的臺灣人與移居臺灣的外省人之間，引渡出異文化溝通與交流的多重空間。

所以催生林海音記憶「臺灣」的民俗書寫，背後動力何在？在政治高壓的年代，充斥宣傳教條的環境裡，林海音銘刻下臺灣風土民俗書寫，是否有意承繼臺灣歷史記憶與文化傳統呢？一九五〇年代正當多數的臺灣本土菁英因爲文字與政治的因素，被迫暫時在文壇上噤聲，林海音得以佔語言優勢，記載不同於中原的臺灣風土意識，比起當時其他無聲的省籍作家，林海音無疑擁有一個比較特殊、能見度高的

41 夏祖麗：《從城南走來——林海音傳》，頁 131。

42 英（林海音）：〈燒金〉，《國語日報》第 3 版（周末周刊），1950 年 9 月 9 日。

發言位置，一方面我們不能忽視林海音是否爲了成就她個人報導臺灣的專業身分，而記憶了「臺灣民俗」？此外，也突顯了另一種可能，林海音在此選擇臺灣此一被視爲邊緣地帶的論述位置來進行民俗書寫，引導讀者注意到她的「本源地」：她是出生於臺灣。正是這樣一種可能，林海音才得以爲自己標劃出一個民俗再現／重構等多重企圖的空間，也無形之中製造了臺灣「得以被看見」的契機。

六、結語

本文鎖定林海音主編《國語日報・周末周刊》（1949-1954）時所發表風土民俗書寫，在《國語日報・周末周刊》中林海音以英、海音、阿英爲筆名，描繪臺灣風土民俗的小文，包括歷史、地理、社會、風俗、物產等多重面向，呈現出臺灣的自然景觀、風俗民情與特有產物。這些民俗小文和林海音以北京童年生活爲主的散文相較，其中呈現的模式頗值得深入探討，這也令我們思索第一、二故鄉對於林海音不同的意義，以及林海音自我定位與寫作位置等核心議題。林海音書寫臺灣之發聲策略也與身分政治等核心課題交結糾纏，並且和她所處的位置有著極爲緊密的關係：林海音不僅具備跨越北京和臺灣複合身分，在多種意識形態的集匯處，也能作爲臺灣和大陸之間的中介角色，調和各方勢力的複雜性，特別是林海音作爲臺灣與中國之間中介的角色，也影響了其對臺灣風土民俗書寫的想像與建構。林海音以中國文化爲系譜，來啓動對臺灣的觀看，某種程度上來說，中原論述對於臺灣文化的閱讀也成爲林海音建構臺灣想像的主要途徑之一，這也是林海音一九五〇年代書寫臺灣相關文本中一個甚爲重要，卻從未被論者提及的一個關鍵點。我們回到林海音選擇描繪臺灣風土民俗此一課題上，林海音固然強調臺灣文化是中國文化的一個支脈這樣的主流論述，但是在反共懷鄉文藝大行其道的一九五〇年代，林海音獨特的臺灣民俗書寫，所創造出來的是國府強勢文藝政策主導下曖昧的灰色地帶。透過林海音的臺灣民俗書寫，臺灣的面貌正以更多元的方式顯影，也讓我們得以更深入推

衍身分位置與空間文化重組所涉及的複雜議題。[43]

[43] 感謝審查委員提示除了林海音之外，婁子匡與朱介凡對於中國民俗之整理與研究是未來可以延續發展之方向，深受啓發，特此致謝！婁子匡在民俗學事業上具有卓越的作爲，除了在 1970 年前後創辦東方文化書局，守護中國民俗文學，也積極投身於臺灣俗文學的研究工作，在《話說人物》、《臺灣人物傳說》中，以珍貴的第一手爲臺灣民間傳說與歷史故事立傳。研究中國俗文學著名的朱介凡，數十年來從事中國諺語、戲曲、歌謠等的研究，著述甚豐，也致力於民俗史料的蒐羅與保存。婁子匡的研究，請參見陳益源：〈民俗學家婁子匡及其著作〉，《文訊》238（2005.8），頁 131-132。朱介凡的研究，請參見宋雅姿：〈浮生若夢盡付笑談　專訪朱介凡〉，《文訊》63（2007.9），頁 14-22。

引用書目

一、原典文獻

編者：〈本報的讀者對象和「趣味」〉，《國語日報》，1949 年 10 月 30 日。

編者（林海音）：〈本刊作者書簡〉，《中央日報・婦女與家庭周刊》，1950 年 3 月 12 日。

英（林海音）：〈媽祖生〉，《國語日報》第 3 版（周末周刊），1950 年 5 月 6 日。

英（林海音）：〈午時水與扒龍船——臺灣端午節〉，《國語日報》第 3 版（周末周刊），1950 年 6 月 17 日。

英（林海音）：〈過七月〉，《國語日報》第 3 版（周末周刊），1950 年 8 月 26 日。

英（林海音）：〈燒金〉，《國語日報》第 3 版（周末周刊），1950 年 9 月 9 日。

海音（林海音）：〈半山還鄉記〉，《中央日報》，1950 年 10 月 25 日。

海音（林海音）：〈光復之後〉，《中央日報》，1950 年 10 月 25 日。

編者（林海音）：〈一百期〉，《國語日報》第 3 版（周末周刊），1950 年 11 月 25 日。

英（林海音）：〈臺灣的香花〉，《國語日報》第 3 版（周末周刊），1950 年 12 月 2 日。

英（林海音）：〈關於植物的〉，《國語日報》第 3 版（周末周刊），1950 年 12 月 16 日。

英（林海音）：〈艋舺〉，《國語日報》第 3 版（周末周刊》，1950 年 12 月 23 日。

英（林海音）：〈冬生娘仔〉（上），《國語日報》第 3 版（周末周刊），1950 年 12 月 30 日。

英（林海音）：〈冬生娘仔〉（下），《國語日報》第 3 版（周末周刊），1951 年 1 月 6 日。

英（林海音）：〈二百年前的北投〉，《國語日報》第 3 版（周末周刊），1951 年 2 月 17 日。

張漱菡編：《海燕集》，新竹：海洋出版社，1953。

林海音：《兩地》，臺北：三民書局，1966。

林海音：《綠藻與鹹蛋》，臺北：遊目族文化出版，2000。

二、近人論述

王鈺婷：〈報導者的「中介」位置——談五〇年代林海音書寫臺灣之發言策略〉，《臺灣文學學報》17（2010.12），頁 133-158。

宋澤萊：〈評郁永河的《稗海紀遊》——並論臺灣文學史上的傳奇時代〉，《臺灣學研究通訊》創刊號（2006.10），頁 108-128。

宋雅姿：〈浮生若夢盡付笑談　專訪朱介凡〉，《文訊》63（2007.9），頁 14-22。

呂正惠：〈五〇年代的林海音〉，收入東海大學中文系編：《戰後初期臺灣文學與思潮論文集》（臺北：文津出版社，2005），頁 615-639。

何素花：〈清初大陸文人在臺灣之社會觀察——以郁永河的《稗海紀遊》爲例〉《臺灣文獻》53：1（2002.3），頁 167-199。

陳益源：〈民俗學家婁子匡及其著作〉，《文訊》238（2005.8），頁 131-132。

張隆志：〈從「舊慣」到「民俗」：日本近代知識生產與殖民地臺灣的文化政治〉，《臺灣文學研究集刊》2（2006.11），頁 33-58。

夏祖麗：《從城南走來——林海音傳》，臺北：天下文化，2000。

許俊雅：〈論林海音在《文學雜誌》上的創作〉，收入李瑞騰主編：《霜後的燦爛——林海音及其同輩女作家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南：國立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籌備處，2003），頁 55-77。

許常惠：〈民族音樂的整理與發展〉，《雄獅美術》86（1978.4），頁 104-109。

廖珮如：〈「民歌採集」運動的再研究〉，《臺灣音樂研究》1（2005.10），頁 47-98。

葉石濤：《臺灣文學史綱》，高雄：文學界雜誌社，1987。

劉智濬：〈從啓蒙觀點看六〇年代民歌採集運動〉，《中臺學報》14（2003.5），頁 279-295。

應鳳凰：〈閱讀林海音：林先生的編輯、寫作生涯與臺灣文壇〉，《國立成功大學

圖書館館刊》11（2003.4），頁 89-93。

應鳳凰：〈林海音與六十年代臺灣文壇——從主編的信探勘文學生產與運作〉，收入李瑞騰主編，《霜後的燦爛——林海音及其同輩女作家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南：國立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籌備處，2003），頁 337-351。

施英美：《〈聯合報〉副刊時期（1953-1963）的林海音研究》，臺中：靜宜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2003。

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等著，陳思仁等譯：《被發明的傳統》，臺北：貓頭鷹出版，2002。

Hayden White, *Metahistory: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3.